

夏家善 主编 | 王宗志 王微 注释

· 中国历代家训丛书 ·

温公家范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
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
教于国。

 天津古籍出版社

中国历代家训丛书

夏家善◎主编

温公家范

王宗志 王微◎注释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公家范 / 夏家善主编; 王宗志, 王微注释. --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6.6
(中国历代家训丛书)
ISBN 978-7-5528-0395-2

I. ①温… II. ①夏… ②王… ③王… III. ①家庭道德—中国—北宋 ②《温公家范》—注释 IV. ①B8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4588号

温公家范

夏家善主编; 王宗志 王微注释
出版人/张玮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91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5 字数 124 千字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8-0395-2 定价: 30.00元

序

我国古代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品类繁多。其中，各种形式的“家训”“家诫”“家规”“家礼”，在普及传统文化、规范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整齐家风以至维持整个社会的谐调稳定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部分文化遗产很值得重视。

“三代而下，教详于家。”清代学者钱大昕这句话，概括地说明了我国古代具有重视家教的传统。“家训”“家诫”一类著作，起源于东汉而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它是当时世族社会教育制度的产物。人们十分熟悉的诸葛亮的《诫子书》，即产生于汉魏之际；而最早系统编撰成书的家训著作，当推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作者撰写该书的直接目的在于“整齐门内，提撕子孙”，而其更深远的意义则是为了“轨物范世”“遗泽后昆”。这类著作以家族和家庭中长辈对晚辈耳提面命的谆谆教谕的形式，将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儒家文化精神通俗地灌输传授给子孙后代，使其“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即利用血亲伦常关系和长辈对晚辈的绝对影响力约束力，达到“助人君，明教化”的目的。各种家训中有关立志、勉学、修身养性、待人接物

的训诫，无非是要求“养亲事君忠孝为本”，“言则忠信行则笃敬”，“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以维持世族的社会地位。这种家教的传统之所以在我国古代社会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影响到近现代，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正如梁启超所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家族宗法制度的客观存在和历久不衰，就为家教传统的延续和“家训”一类著作的蕃衍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被视为“古今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一书问世后，曾辗转流布，反复梓刻，虽历千余年而不佚，在其影响示范之下，各种形式的家训、家教、家规、家约、治家格言之类著作层出不穷，无代无之。如若将这类著作加以汇集，恐怕有数百千家之多，显然这是一笔不容忽视的历史文化遗产。

从文化的视角来审察，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其内容丰富而芜杂，但总的来说，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儒家文化。受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历代家训也深深地打上了儒家思想的印记，透过其或典雅精微或通俗易懂的言辞，其着力宣传之要旨大抵不外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立人”“达人”“爱人”“谅人”的“忠恕之道”，以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的“絜矩之道”。也就是说，儒家所倡导的文化价值观念、理想人格模式和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历代家训的主要精神支柱，是“儒者宣而明之”欲使其“家至而户说”的基本内容。当然，受释道思想文化的影响，古代家训中也夹杂着若干儒家文化以外的其他思想成份或因素，如道家之“无为”，佛家之心性修养等等，这也完全是事实。家训作为在历史上产生和发展的文化现象，它也不可能不带有其所经历的各个时代的烙印，但从实质和

总体上来看，它还是以儒家的忠孝仁义为本，吸纳融汇某些佛道思想，不过是作为达到忠孝仁义的手段而已。

显然，就思想内容而言，历代家训并非如前人所夸誉的那样，是“篇篇药石，言言龟鉴”，但它也绝不是一堆粪土，不是一堆完全有害无益的封建糟粕。对于家训这种既包含着糟粕，又包含着许多人生智慧和真、善、美的启示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像对待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一样，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分析和批判继承的态度。任何一种文化体系作为完整的结构，都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层面，每一层面又可以分解为若干要素；换言之，文化要素构成文化层面，文化层面构成文化系统。对它们是可以加以分析分解的，也可以根据新时代的需要进行重组或新的综合。我们对待历代家训也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区别良莠，批判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改造继承吸收其富有生命力的或在今天仍有启迪借鉴意义的文化内容，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

既然古代家训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大多出自历代帝王、名臣宦宦、封建士大夫之手，而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倡导，它就不可能不带有封建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特征，不可能不大量宣扬封建道德观念。例如，历代家训中反复强调必须遵从封建的纲常名教，倡导愚忠愚孝的封建伦理道德；反复鼓吹“学而优则仕”、“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士大夫观念；反复提倡安常处顺、知足常乐、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和保守思想，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都属于封建思想的糟粕，是应该批判和舍弃的。这方面的思想流毒在今天仍不能忽视。

另一方面，历代家训中还包含着相当多的思想精华和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在教育后代如何处世做人的论训中，提供了前

人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智慧，自觉或不自觉地宣传和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些富有生命力的内容，都可供我们发现剔抉、含英咀华和借鉴吸收。从大的方面来说至少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其一，鼓励立志。如诸葛亮《诫外甥书》说：“夫志当存高远，……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温氏母训》说：“岂有子孙专靠父祖过活之理！……若肯立志，大小自成结果。”

其二，奖掖进学。如诸葛亮《诫子书》说：“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颜氏家训》说：“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

其三，劝勉勤俭。《朱柏庐治家格言》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明吴麟徵《家诫要言》说：“治家，舍节俭别无可经营。”“茹荼历辛，自是儒生本色。”

其四，提倡清廉。《景氏家训》载胡康公诲诸子曰：“予居官四十余年，无他长，但‘清白’二字，平生守之不失。尔曹今日虽未有官守，务全名节，金帛易动人，远而勿亲。”高攀龙《家训》说：“世间惟财色二者，最迷惑人，最败坏人。”

其五，导人行善。《朱柏庐治家格言》说：“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家诫要言》说：“待人要宽和，世事要练习。”“恶不在大，心术一坏，即入祸门。”《弟子规》说：“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能亲仁，无限好，德日进，过日少。”

此外，历代家训还在强调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应世涉务，分阴惜时，遵守礼仪，尊敬师长，孝顺父母，慎择朋友，睦邻友好，

克己让人等许多方面，都有一些精采的议论和非凡的识见，有的至今仍能给人以真的启迪、善的奉劝和美的鉴赏，展示出永久价值和魅力。这些积极的内容自然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必须继承和发扬的。经过批判的分析和创造性的转化，完全可以用来作为对青少年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有益资粮和历史教材，倡导良好的家风亦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和谐发展。

《中国历代家训丛书》的主编夏家善同志，是我刚调到南开大学工作时就已相识的老朋友。他长期研治中国文学，详熟古代文化典籍，特别瞩目于历代家训的搜集整理，用力甚勤，颇有心得。这套丛书就是他从我国历代家训中精选汇编出来的，共计十二册，虽分类汇编而又构成一完整系统，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并邀请专家学者对各书分别加以标点、注释和说明，以便于读者准确地把握其思想内容，从中汲取智慧和涵养。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夏家善同志向我征序，作为老朋友，我觉得难以拒绝，于匆忙中写了上述粗浅的认识，不当之处请编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方克立

前 言

本书书名康熙年刻本题《温公家范》；乾隆年刻本题《司马文正公家范》。因作者司马光在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病逝后，被追封为温国公，我们选用了本书最早的名字——《温公家范》。

《温公家范》的作者司马光，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名人。司马光打破水缸救小伙伴的故事，现在家喻户晓，人们从中知道他是一个有智有义的儿童；史学界则更看重他的宏篇巨制《资治通鉴》，认为他是了不起的史学家，至今他的丰硕成果仍是研究历史的较为系统而完善的资料；许多哲学家则把他看作上承孔孟，下启朱子（熹）的儒学大家；从政治的角度看，他虽然为相仅八个月，但仍不失为一代名相；至于他的人品，就是他的政敌王安石也称誉他为人方正，并与之私交颇厚。司马光一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遗著除《资治通鉴》外，尚有《独乐园集》《书仪》《稽古录》等。这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产生过不同的影响。《温公家范》也是其中之一，曾附于《司马文正公全集》之后行世。

可能是由于《资治通鉴》的光芒掩映，《温公家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其影响不及颜之推的《颜

氏家训》，甚至也赶不上被称为“《颜氏家训》之亚”的《袁氏世范》，因而它只以“家刻”的形式作为家教之法。直到清朝初叶，才有人发现旧本，认为这部书不仅司马光本人“一生得力于是”，而且“有裨于世道人心非浅”，有普遍的教育意义。于是校正重刻，使之流传。

本书像其他家训书一样，以治家、齐家、教家为基本内容。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把“修身、齐家、平天下”作为一个问题的三个环节来看待，而“齐家”又处于其中重要的中间地位。先贤们认为：只要在“治家”上严正有成，则“穷”可以自修其身，“达”可以兼济天下。

本书的取材，主要来自“经”“史”，偶尔涉及“子”部。几乎处处言之有据，这从史料学的意义上看，可信度高。这是由司马光的为人方正、治学严谨所决定的。

我们今天标点注释此书，主要是因为它在内容上还有不少可参考借鉴之处，希望它能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有裨于世道人心”。诸如：

第一，在“才”与“财”的关系上，作者认为：“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对于个人来讲，缺少钱财固然生活不易，多了再处置不当，无论对“贤者”“愚者”都可能增加过错甚至罪恶。

第二，在“才”与“官”的关系上，作者认为：“能薄而官大，是为婴害；无功而家昌，是谓积殃。”人的能力有大小，才智有高低，如果一个人的才能与官位的高低不符，则不是好事；才能低而当了与之不相称的大官，就好象得了缠绵难治、痛苦难忍的慢性病，于国于己都不利；如果自己为国、为民没有做出什么贡献，

却能使自己家庭兴盛阔绰，那么财富聚敛愈多，积祸积殃也愈大，可谓于国、于民都有害了。

第三，为官良恶的标准上，书中有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话：“儿子从官于外，有人来言其穷窶不能自存，此吉语也；言其富足，车马轻肥，此恶语也。”自古以来以廉洁自律的官员，靠薪俸而大富者没有。如果人们说他不富裕，说明他没有另辟途径去捞钱，这是吉利话、吉利事；如果说他的生活富足、车轻马肥，那就是可怕的话、可怕的事了。就是在今天，这话也还有借鉴意义：如果一个“公仆”的私有财产和消费水平大大超过了他的正当收入且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话，不也同样是可虑、可疑、可怕的吗？另外，他也从正面提出了为官的标准：“家贫而国富，君敬之，民戴之。”

第四，在对人的划分标准上，书中有这样的话：“人无贵贱，顾其为善如何耳。”这除了劝人为善之外，出自一个封建时代的大官之口，不也是可贵的吗？

第五，讲求孝道是儒家思想堡垒的一块重要基石。本书有这样的话：“孝子之丧亲也，三日而食。”本来丧父丧母这样的大丧，子女哀戚，影响正常进食并不为怪。但这里主张三日之后就要正常进食，否则哀毁过甚，影响了生者的身体健康倒是有违孝道的。这可以说是一种求实求是的态度。

对于尊长的错言错行，这里也不主张一味盲从，而是主张“几谏”——婉转地进行劝说。

第六，有关适时地择地而葬，一直被看作是一件大事。儒家经典多次谈及。本书的作者针对当时泛滥的“择葬地而希官爵”“选葬时而规（窥）财利”，靠搬动祖先的尸骨而祈福子孙的丑恶现象，引经据典地进行了犀利的批判，今天看来，仍有相当大的说服力。

当然，身为封建时代大官僚的司马光，他的思想中也必然有许多偏见与局限。比如：

书中不止一次提到：“彼戎狄也，尚……”文中在赞扬某些边远地区的人物及其作为的同时，反映出了他所持有的唯我中原是文明之地、唯我汉族是文明之族的偏见。

像许多儒家著作一样，对“妻妾众多”“多子多孙”持赞扬、肯定的态度。

有些从正面举出的例证，在今天看来简直是愚蠢可笑的。在讲到妇女贞节时，有一个“牵臂断臂”的故事：一个寡妇被人拉了一下手臂，她认为受了辱。为了避免辱及全身，竟砍掉了曾被人拉过的手臂。

这些显见的悖谬，依读者今天的水平若另费笔墨批判，倒是蛇足了。

我们标点整理《温公家范》，以康熙年间刻本为基础，适当参考乾隆年间刻本。在标点注释时，采用分段见注的体例。对生僻字词、人名、地名、官名、称谓、历史典故、帝王年号、重要的引文出处等，都尽量作了注释。注释力求简明精炼，通俗易懂，并适当吸收了一些先贤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谨此致谢，恕不一一注明。

由于时间紧迫，加之功力所限，谬误恐在在多有，尚祈专家、读者教正。

王宗志

目 录

《温公家范》序	1
卷之一	
治家	13
卷之二	
祖	31
卷之三	
父	40
母	52
卷之四	
子 (上)	72
卷之五	
子 (下)	97
卷之六	
女	121
孙	131
伯叔父	138
侄	142

卷之七

兄	144
弟	151
姑姊妹	174
夫	179

卷之八

妻 (上)	189
-------	-----

卷之九

妻 (下)	210
-------	-----

卷之十

舅甥	232
舅姑	235
妇	238
妾	245
乳母 (保母附)	249

后记	255
----	-----

《温公家范》序

人知朱子集濂洛关四子之成^[1]，不知涑水文正公亦朱子所取则^[2]。朱子志在《纲目》^[3]，行在《小学》^[4]。《资治通鉴》实《纲目》胚胎，《小学》与《家范》又互相发明者也^[5]。顾《通鉴》、《纲目》二书并行，何《小学》列学官而《家范》不传于世与^[6]？文正公尝谓：“尽心行己之要在立诚，而其功自不妄语始。”《家范》所载皆谨言慎行，日用切要之事。公一生得力于是，而其有裨于世道人心非浅焉。予偶得旧本，读而珍之，为校正重刻以公同志^[7]。

康熙五十八年冬至月 高安后学朱轼序^[8]

注释

- [1] 朱子：即朱熹（1130~1200）。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侨寓建阳即今福建建阳县。曾任秘阁修撰等职。从事教育五十余年。谥“文”。一生著作极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

集注》《朱子语类》等。濂洛关四子：即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周敦颐原居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的濂溪，故以他为代表的学派称之为“濂学”。朱熹之后，濂学被尊为理学的开山祖。程颢、程颐为洛阳人，故以他们为代表的学派称之为“洛学”。对后世理学有深远的影响。张载，因张载讲学于关中，故以他为代表的学派称之为关学。在哲学史上的濂、洛、关、闽被视为宋明理学的四大学派。而“闽学”则以客居福建的朱熹为代表。

[2] 涑水文正公：即司马光（1019~1086）。北宋大臣、史学家。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宝元进士。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所编《通志》赐名《资治通鉴》。哲宗继位，召他入京主国政，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废除王安石新法。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谥“文正”。著作除《资治通鉴》外，还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温公家范》等。

[3] 《纲目》：即《资治通鉴纲目》。朱熹与其门人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编成。“纲”仿《春秋》之“经”，以大字作为提要，“目”仿《左传》之文，以小字备言史事。为纲目体史书的始创之作。

[4] 《小学》：儿童教育课本。宋朱熹、刘子澄编著。辑录符合当时道德标准的言行编成。全书共六卷。内篇包括《主教》《明伦》《敬身》《稽古》四卷；外篇包括《嘉言》和《善行》二卷。

[5] 《家范》：即《温公家范》。发明：启发，开扩，阐明。

[6] 列学官：列入掌管教育的官员教育弟子的教材。据考，《小学》一书出于朱熹，而类次编定则出于朱熹弟子刘清之（子澄）之手，是当时向儿童进行儒家传统思想教育的教科书。明成化初（1465~1472年）陈选以御史身份督学河南时，作《小学集注》，清张伯行、黄澄、蒋永修等皆有《小学集解》，使此书应用于学官教学更为广泛。

[7] 同志：志气相同的友人。

[8]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己亥）。冬至月：公历12月。

高安：唐武德五年（622年）以建城县改名，治所即今江西高安县。

朱轼：清朝高安（今江西高安县）人。字若瞻，又字可亭。康熙进士。累官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瑞”。著述有《易·春秋详解》《礼记纂言》《周礼注解》《仪礼节略》等。